

# 第 1 章 绪 论

## 1.1 投资结构研究的背景

在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大部分经济学家们把投资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总量的研究上面，而对于结构的研究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50 年代以来，以库兹涅茨、钱纳里为首的经济学家开始了对于结构问题的长期不懈的研究，结果发现，近代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整个结构的变革。人类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走向了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人类又迈向以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一国经济发展是否成功，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整个结构变革是否真正地获得成功。具体地说，一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不仅取决于总量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而且还取决于一国结构转变模式的选择是否适当、转变的速率以及转变过程中各要素是否协调。

开此先河后，整个经济学界对于结构的研究几乎波及到所有的领域。60 年代以来，日本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台湾省、香港和新加坡也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成为亚洲的“四小龙”。理论研究对于经济学主题的转变，同时，现实又展示了短时期内通过结构变革获得成功，使得结构问题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上升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高度。一些目前仍然处于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界都将结构的变革作为摆脱落后的战略来对待。

纵观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我们发现 仅从经济学的范围来考察，对于结构问题的研究，大体上说，分为两

大类：一类是泛结构研究。所谓泛结构是指经济的整体结构，具体地说，就是经济结构，它包括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构成，例如，企业结构、产业结构、资金结构、资源结构、生产力结构等。泛结构研究的重点，是将各个方面的构成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寻找出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调节机制。二是专门结构研究。与泛结构研究不同的是，专门结构的研究是以整个经济运行作为研究的背景，只将经济运行的一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方面，它要研究这一专门方面内部构造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它还要研究这一专门方面对其外围方面的关系，从而提出对这一专门方面进行调整的政策，以适应整个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例如，对于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资金结构、资源结构等专门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类。

在专门结构研究方面，应当说，无论是就国外而言还是就国内来说，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产业结构研究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成果。它对于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的启迪与指导起到了不可估价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客观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是以投资主体的经济人格化为前提的。进一步说，在以私有制为企业制度基础的条件下，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准则是利润的最大化。受这一准则的支配，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成长，都是在一种自发或遵循自发的引导的力量下完成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不能模仿西方经济学家的思路。具体地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研究产业结构的重点不应当只说明问题的存在，而应当说明这一实在的成因，以此为研究的重点似乎才有希望从根本上揭示产业结构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有些产业结构研究的著作曾经作过这方面的努力，但由于未能跳出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的圈子，从而总是令人感到多有未能尽兴之感。

基于这种感性的认识，我们设想，要说明中国产业结构的形成

及其机制，就需要对投资结构作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人们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到目前为止，在我国仍然没有一部系统地研究和探讨投资结构问题的著作，<sup>①</sup>这与我们这样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后起型国家的地位很不相称，也与我国目前投资结构中的诸多问题很不相称。无论是按照罗斯托的成长阶段来划分，还是按照钱纳里的型式来区分，我国处于一个由落后国家向中等发展水平国家转变的阶段，应当说，这是一个共识。对各国经济成长的历程作实证的分析，人们发现，在这一阶段上的国家往往是结构变化最为显著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一阶段上的国家能否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乃至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主要是由结构的剧烈且成功的变革而推动的。库兹涅茨、钱纳里和罗斯托等西方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一判断。实际上，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投资结构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国家成长为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目前正在进入工业化的新阶段，从而造就了综合国力比较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在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始终受到结构问题的困扰，投资结构扭曲已经成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生产力的地域结构不合理的重要根源之一。

因此，研究投资结构问题，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偏好，而是由我国经济现实所产生的需要和呼唤。正是基于这种不一定非常准确的认识，我们开始了对于投资结构的初步探索，以期能够在此方面引起人们的应有重视。

应当说，自“七五”时期以来，人们开始重视投资结构的研究了。例如，在“七五”期间，国家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曾经接受了一项有关投资结构问题研究的课题。

## 1.2 投资结构研究的目的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能够通过对各国投资结构和我国投资结构的分析与评价，探索投资结构成长的一般规律以及我国投资结构成长演化的特点，并从这种一般性的规律和特点中找到适合于中国投资结构成长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对于优化我国投资结构的基准、条件、障碍和途径提出一些粗浅的政策建议。

投资结构成长和演化不是一个历史的随机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阶段特征和型的运动过程。关于这一判断，我们是从四个经济发展先行国的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纵观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投资结构成长和演化的历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之前，这四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都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农业所提供的剩余食物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农业本身的需要这几乎是四个经济发展先行国的共同特征。<sup>①</sup>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引导经济起飞的产业群体大多由这样几个产业构成：炼铁、纺织、交通、煤炭等产业。在经济进入初步的起飞以后，化工、钢铁、建筑工程、机械等产业成为投资结构中的主导力量。当经济进入工业化的高级阶段以后，真正具有现代工业特征的产业便开始崛起，汽车、机电设备、重化工业、耐用消费品等遂成为主导产业。在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投资结构开始走向“空心化”和高技术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现代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并不发达

关于美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一些。因为，有些史学家认为，在美国工业的前夜，正是美国农业处于受到自然灾害和外界挑战的不利时期，并由此认为，美国的工业化是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被迫”的选择。对此我们又进一步分析和核对了有关历史资料，发现美国在“前夜”之前，美国的农业所提供的食物剩余量足够把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至于美国选择在农业生产处于低潮时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正是一种长期的“地火”寻找到了脆弱“地壳”的出口，与我们的判断是不矛盾的。详细论证见第 3 章。

的农业等第一产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面临的发展任务与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一个重要之处，是我们既急需发展我国的现代产业，又必须同时发展农业等第一产业和基础产业。由于这一十分重要的区别，使得我国投资结构的选择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向现代产业投资倾斜，就要削弱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投资，从而使得本就薄弱的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更陷于落后的境地，反过来又制约着现代产业的发展；向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进行投资倾斜，因其具有需要大量的投资和产生效益的期限长的特征以及需要现代产业提供装备等特点，不仅会制约着现代产业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第一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发展。纵观我国投资结构成长和演化的历程，很显然，我国选择了首先发展现代工业的道路。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存在着什么失误，而且应当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问题是，我国现代产业的发展超出了其他产业发展的承受能力，形成了“单兵突进”和“两翼滞后”的格局。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在“单兵”产业的内部也存在着结构扭曲的现象。因此，我国的投资结构演化虽然跨度很大，浓缩了西方发达国家近 200 年发展的历程，但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综合整体贡献却较差。

过去的缺憾已经成为遗产。面对这份遗产和投资结构发展的未来趋势，从发展战略的角度上考察，我们在利用现有投资结构的优势甚至于其缺陷方面仍然具有许多可供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机会。这些优势主要包括：第一，现代产业已初具规模，我们已经拥有追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基础。第二，我国在东南沿海地区已崛起一片大有希望的“发达地区”，赶上和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时间不会很远。第三，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以利润为驱动力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热潮已不可逆转，市场已经冲破国界的束缚。第四，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虽然处于瓶颈状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整个经济的发展才不会遇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充满活力的状态。

但是，上述可供我们利用调整投资结构机会来发展我国经济的，

也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已。要使这些机会变成现实，就必须对我们由传统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进行彻底的革除。

对于传统经济体制的批判，我们一直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为此，我们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面对现实，我们应当站在一个新的历史的制高点上去认识，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体制。

关于传统经济体制中的缺陷对于投资结构扭曲所造成的后果，本文的最后的几章要进行详细的说明，在这里，我们仅就其中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给予揭示。

第一，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之一，是把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机制对立起来，从而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管理体制的设计以及实施过程中都以计划管理为第一，试图使一个经济成分复杂、生产力水平地区差异很大的大国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在某种计划的管理下达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sup>①</sup>的目标。且不论我国计划管理的科学性和实际水平到底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具有科学性的计划，决不是与市场相对立的。因为，一个真正科学的计划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和进行不断调整的。在这里，市场是前提，是客观存在，是第一位的，而计划则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制定的，计划是后果，是主观的，是第二位的。不是计划指导市场，而是市场决定计划，计划服从市场。计划只是在市场失效的地方才起到调节的作用，而在市场能够很好地调节经济特别是调节投资结构的地方，就不应当再让所谓的计划插进一脚。改革实质上是放大市场的功能，使市场的机制在每个应当发挥功效的角落里生根。而计划则需要重新脱胎换骨，具体地说，这里的计划已经不是传统体制下的计划，而是一种跟着市场转的计划，是完善市场的一种计划，决不是所谓的指导市场的计划。正是在这种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界定的意义上，我们才有可能使得我

贾谊：《治安策》。

国的投资结构顺应市场的需要而进行不断地调整，从而达到比较优化的目标。

第二，所有制形式的选择。确立市场在整个投资结构形成中的主导作用，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市场能够自发地对于投资主体产生内在的约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投资主体本身具有与市场相对应的性质。市场的性质，说到底是由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来决定每一种产品、每一位主体的存在价值。投资主体本身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要取决于市场的检验和决定。当一个投资主体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那么，它的存在价值（除非极其特殊的原因，例如某些国防部门、公共设施部门等）就没有了。传统体制下的投资主体的政府化现象以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表现出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得市场与投资主体的性质分割开来，从而只要投资主体披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外衣，无论市场是否需要，它们都可以安然无恙地存在，因为它们可以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保护。如果这种投资主体政府化的现象不能消除，市场对于投资结构的调节将永远是一句空话。应当说，现在该是对于投资主体的外衣进行更换的时候了。

从传统的所有制形式转换成新的所有制形式，不应当是理论家们的“坐而论道”的空谈，而应当大胆地试验，向实践学习。近年来，深圳、上海股份制的改革已经证明，股份制可能是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一种选择。尽管它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但是，我们总算有了一线希望：通过股份制改革既保持公有制性质，又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现有公有制形式造成的低效率的问题。

第三，投资结构发展战略的选择。现代经济已经不是 100 年前只要大力发展工业就可以带动一切发展，也不是通过所谓的进出口贸易就能够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引擎作用的时代了，我们面对一个新旧产业都需要发展并要避免先行国的“工业病”的复杂现实。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又面临着外援有限、国内建设资金缺乏的挑战。在这两项约束条件下，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和资源进

行合理而有效的分配，是投资结构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确立投资结构的优化状态，不能缺乏理论基础。目前已有的并可以指导投资结构发展战略的理论大体上存在着三种：筱原基准、赫希曼基准和偏差协调理论。综合这三种理论的优点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粗浅分析，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基准：相机抉择基准。它的基本内容是，在总体和长期的角度上，政府的投资结构政策应当采取力求投资结构均衡的方针，在中短期内，政府则应当针对具体的投资结构状态，根据“木桶原理”，采取必要的政策对投资结构实行倾斜，最终求得与长远方针相一致的效果。当然，实施这个基准并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将是一个永远伴随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为此，我们提出了投资结构优化的三个层次的战略目标。首先，直接目标，即在 3—5 年的时间内，将我国的基础结构、基础产业和农业低层次的滞后格局扭转过来。其次，中间目标，即在 10 年时间内，实现基础产业和基础结构的适度超前发展，实现投资结构的高度化和克服区域结构的趋同化问题。最后，战略目标，即在下世纪初，建立以高技术产业为主导、全方位开放的投资结构体系。

### 1.3 本书研究的内容概要

由于专门研究投资结构的专著在国内并不多见，并且我对于专著的谋篇布局方面又缺乏经验，纵观全书可能令人费解，为此，我对本书的研究设计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本书共分 10 章，由三大部分组成。

除绪论外，第一部分为投资结构的决定、演化成长规律和实际成长的条件。第二章投资结构的决定主要分析了投资结构的内涵和基本决定因素。一般说来，投资结构是指投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类项目上的分布比例关系。投资结构主要由这样几个基本因素决定：1. 自然条件。自然条件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可以从如下

几个方面予以考察：首先，与气候条件和可耕地面积相联系的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投资结构的决定作用。其次，自然资源对于投资结构的产业体系完整度和均衡度的影响。最后，自然资源对于投资结构扩张程度的影响。

2. 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对于投资结构的决定主要表现是需求变化对于投资结构的巨大作用。恩格尔系数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恩格尔系数是不同的，从而对于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导向作用也是不同的。

3.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作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各领域中的运用显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新兴产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是技术进步的直接硕果；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传统产业部门和整个传统国民经济结构都产生了量和质的深刻变化。这样，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一批批新兴的投资部门产生了，从而新型的产业部门也就出现了，原有的传统产业部门利用新的技术得到了改造和武装，素质和规模都可能得到非常迅速地扩张。

4. 组织要素。在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分析中，人们往往忽视组织要素对于投资结构的巨大影响作用。其实，组织要素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可以看到：一是政府对于投资秩序的管理和监督；二是投资项目的规模经济水平；三是投资项目规模之间的比例与关系；四是投资主体的行为。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利用了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投资结构决定的理论模型，并提出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

第三章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探讨了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投资结构成长的型式。首先，英国的投资结构成长型式。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叶，英国投资结构的成长呈现出三种型式：第一种型式出现在英国的经济起飞阶段。投资的主导部门是纺织、煤炭、制铁；第二种型式是第一种型式的继续，投资的主导部门呈现出以铁路为核心、以钢铁和煤炭业为两翼的态势；第三种型的特征并不十分突出，主要以建筑业（建筑材料、住房）为投资的主导部门。自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英国的投资结构发生了两次比较明显的变化：一次

是从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期为止的以冶金、化工、机械、造船、金属制品、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为重点的投资结构型式；另一次是从 7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初期为止的以矿业、运输机械为主要投资重点的型式。其次，美国的投资结构成长型式。美国在大约 200 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 5 次较为明显的投资结构成长型式的更迭。其先后顺序是：以棉纺织及制铁业为中心的结构型式，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结构型式，以资本货物尤其以钢铁为中心的结构型式，以汽车工业及电气设备、耐用消费品和房屋建筑为中心的结构型式，多元复合型的投资结构。再次，法国投资结构的成长型式。对于法国的投资结构是否出现过型式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但是，无论如何，法国投资结构的成长事实却是存在的。在 18 世纪下半叶到 19 世纪上半叶，棉纺织业、丝织业处于主导地位，在 19 世纪下半叶，工程、钢铁、铁路和煤炭业是投资结构中的主导部门，这种型式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期，并从此时开始，人造纤维、电气工业进入主导部门的行列。当然，法国投资结构成长型式的明显特点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是独立地对整个国民经济成长起到非常明显的主导作用，一个比较稳妥的结论是法国的投资结构成长过程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潜移默化的过程。最后，德国的投资结构成长型式。德国是先行国家中的一个后起国家，它的投资结构中的主导部门起步于铁路建设，接着便是煤炭、机械和钢铁部门以及非农业住宅成为了投资的主导部门。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以联邦德国为分析的对象。联邦德国的投资结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以消除瓶颈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型式；一个阶段是 6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的新兴产业，特别是以第三产业为核心的投资结构型式。

第四章是第三章的继续。我们对于四个经济发展先行国投资结构成长的过程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考察。首先，我们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这四个国家投资结构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因为，作这样的考察对于我们认识投资结构成长的一般规

律可能有所帮助。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其一，投资结构成长的起点都是源于农业和面向农业的产业。其二，在经济发展进入起飞阶段的前后，交通运输部门成长为投资的重点。与此同时或稍后不久，资本品和能源成长为投资的重点部门。其三，从低级的投资结构向高级的投资结构演进。其次，我们分析了投资结构成长的速率。投资结构成长的速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投资结构改变的程度。我们发现，自 50 年代以来，四个经济发展先行国的投资结构成长速率具有两大共同趋势：其一，制造业投资的速率具有逐渐放慢的趋势；其二，总的看来，四个国家的投资结构改变程度并不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可能是自 50 年代以来，这四个国家已经建立起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进入一个常规的发展阶段，经济运行中原有的创新进入了具体的应用阶段，新的发展机会似乎还在酝酿之中，特别是工业部门，它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正在缓慢地下降。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投资结构成长变化的两种假说：结构更新周期假说和结构扩张规则假说，以便说明投资结构演化的机制。再次，我们分析了投资结构成长的直接条件。我们认为，投资结构的成长固然离不开第二章中说明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但是，就直接的因素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如何则对投资结构成长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一，市场容量。市场容量是指市场上供求量的总和。我们发现，早期西方国家投资结构的成长和近期投资结构的变化都与这个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容量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例如，早期英国投资结构的变化是由其国际市场的垄断地位决定的，而在本世纪以来英国由盛转衰则是由其国际市场的丧失决定的。当然，其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下降又是由其国家产业的竞争力的下降决定的。第二，市场结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范畴。在过度竞争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建设项目要么表现为规模的不经济性，要么表现为市场效率的损失。这两点均对于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三，社会先行资本。社会先行资本亦称基础结构投资。现代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交换经济，而交换的经济性和交换的范围主要取决于社

会基础结构的发展水平。我们曾经实证分析过，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起飞的前后都曾经出现过以交通运输业为核心的投资结构型式，这种现象应当说决不是偶然的。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设施，就没有现代经济的起飞，这样的论断丝毫不过分。第四，农业的生产率。现代投资结构的发展好像只是以第二、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为核心内容的，而农业只是隔日黄花了。其实不然。在上一章中，我们曾经论述过，在西方国家经济进入起飞之前，农业的生产率就已经很高了，具有足以支撑起现代经济起飞的能量。即便如此，在经济起飞之后，西方国家也没有忘记对于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问题。因此可以说，不仅仅在我国农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就是在西方国家，它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作为第二部分，从第五章开始，我们转入对我国投资结构的考察。这部分由四章构成。在第五章中，我们首先考察了我国投资结构的质量。第一，我们考察了我国投资结构的高级化程度。通过对投资结构高级化程度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我国投资结构在整个世界投资结构演进中所处的阶段。我们从份额分布和费用构成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从份额分布的角度上看，尽管存在着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是，如下三个方面则是比较明显的：我国农业投资的比重比西方国家大大地超前下降了，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进入起飞前的水平。工业投资比重比西方国家具有十分明显的超前特征。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则是严重地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起飞前后时期的水平。从费用构成的角度上考察投资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可以确定投资结构中的技术“含量”水平。根据对各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长期考察，固定资产投资费用构成变化具有这样一种趋势：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建筑安装工程的投资比重定会不断地下降，设备投资的比重则会相应地提高。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费用构成与西方国家的投资费用构成相对

比，大体上说，我国的水平也就相当于西方国家在本世纪初叶的水平，而且这还照顾到一些特殊情况。当然，这其中也许还存在着不可比的因素，但无论如何，我国比西方国家落后半个世纪是没有问题的。

第五章中的比较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似乎令人感到遗憾。但是，第六章对于我国投资结构贡献分析所产生的结论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化是导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时，应当把结构的变革纳入其中。实际上，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早已开始分析结构变革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考虑到我国缺乏计算投资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数据的情况，首先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对于这种贡献的大小进行一下试算，只作为人们的一个参考。以 1981 年和 1990 年两个时点作为对比的样本，所得出的结论是，以产值作为测度的基础，投资结构的贡献是，报告期（1990 年）比基期（1981 年）提高了 125.16 元，以利税作为测度的基础，投资结构的贡献是，报告期（1990 年）比基期（1981 年）减少了 0.34 元。其次，我们试图计算出各部门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应当说，只要我们利用前人计算出来的各部门投资效果系数，并将它们在整个系数（假设整个系数为 1）中的比重重新计算，便可以确定每一部门的贡献。但是，在具体的试算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在计算投资效果中考虑时滞问题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我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增加额与投资的增加额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增加额与当年的投资额具有非常高的相关性，而与次年、再次年……的相关程度就大大地下降了。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曾预料到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没有把各部门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计算下去，只是留下了一个进一步有待人们去探讨的思路。

第七章进入对于影响投资结构形成机制的分析。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对于影响投资结构的市场及其相关因素的讨论。我们提

出：就主要方面来讲，决定投资结构的基本要素应当是市场而不是其他。如果说，我国过去投资结构没有考虑到这一主要方面，那么，这正好说明我国投资结构扭曲的成因。首先，我们指出了市场与投资结构的基本关系。这种基本关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市场是投资结构存在的经济基础；第二，市场是投资结构有效成长的前提条件；第三，完善的市场是实现投资结构中规模经济化的重要途径；第四，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功能健全的市场结构是投资结构保持合理状态的必要条件。当然，在有些条件下，市场的作用可能会失效。按一般的论述，我们就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与投资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我们对于价格与投资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研究。我们认为，价格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说到底是利润率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 1979 年以前，决定我国投资结构的主导力量不是价格，而是非价格力量。在 1979 年以后，价格力量逐渐增强，它从两个方面显示出来：一是价格变化幅度大并可以产生更多利润的产业部门，其投资的增量就比较大；一是价格受到严格压抑且利润很薄的产业部门，其投资增量就比较小，这些部门基本上都是那些瓶颈部门。再次，我们将利率与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我们对于我国利率的变动与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利率没有充分发挥出调节投资方向的作用。最后，我们对于税收、补贴与投资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税收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可以从三个层次上予以分析：第一个层次是直接与投资相关的税收。这种税收主要是以前的建筑税。实证分析显示出它对于投资结构没有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新实施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税的效果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第二个层次是在生产环节中的税收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就我们能够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产品税、增值税、调节税、营业税对于企业选择投资结构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影响特别明显的是产品税。第三个层次是各个企业

的税收上交对象。因为，有些企业的税收要交给中央，有些企业的税收要交给地方。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投资结构具有趋同化的现象，从而证明了税收上交对象的不同也会对投资结构产生影响。补贴对于投资结构是否也有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补贴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应当说有积极的一面，即它对于维持低利润率行业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补救行为。但是，我们发现，在一些本来属于高利润率的行业中也有相当企业处于需要政府补贴的状态，从补贴与上缴税利比看，化工、轻工业、纺织工业要高于电力、交通、建材部门。所以，长期以来的补贴也对合理投资结构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第八章对于我国投资结构形成的制度背景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我国的投资结构的形成乃至前一章中所论述的市场、价格等对于投资结构所产生的影响都与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具有相当显著的关系。对于投资结构形成的制度背景，我们从三个角度展开了分析。首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展开。第一，我们分析了传统体制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造成投资结构扭曲的根本原因。第二，我们分析了自 1979 年改革以来双重体制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我们的分析显示，投资宏观调节主体内部结构中的利益摩擦、政府的双重身份、宏观调节手段的矛盾是造成双重体制对于投资结构扭曲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我们分析了中观体制对于投资结构的影响。中观投资主体的行为所表现的“双向博弈机制”和“诸侯意识”是导致投资结构扭曲的最重要的原因。对于这两个原因，人们早已给以了注意，但是，这两个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消除这两种现象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宏观和中观政府的职能予以彻底的转变。最后，我们对投资结构形成中的微观制度背景进行了分析。微观体制的核心内容是企业的管理体制。我们注意到，在不考虑中观和宏观体制的前提下，就企业

体制本身来讲，在其内部就蕴藏着内在的扩张冲动。这种冲动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沿着投资结构正确成长道路的扩张冲动，它是否考虑了市场需要，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也许不是。另一部分则是逆投资结构正确成长轨道而成长的扩张冲动，基本上说它是不考虑市场是否需要的。说明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对于其根本原因的解释。我们不同意科尔内的“企业本身具有内在的投资饥渴症”的说法。我们认为，企业的做法不仅是原谅的，而且也是合理和必然的。因为，中观和宏观体制本身具有引诱企业做出这种选择的因素，企业这种投资方向选择是外在体制本身的结果。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企业对于投资方向的选择没有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内在的因素之一，就是所有制方面的缺陷。

本书的第三部分由第九章、第十章构成。

第九章首先就投资结构的优化标志、基准和目标提出了自己不甚成熟的看法。我们提出，从部门结构考察，投资结构的优化应当以如下几点为标志：第一，投资的部门结构应当符合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它包括三点内容：一是要重视最为简单也是最为基础的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应当对农业给予真正的高度重视；二是要注意投资结构的高级化趋势；三是要注意投资结构成长的阶段特征，要循序渐进。第二，投资结构的部门结构是否与需求结构相适应。这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的部门结构是否与社会最终需求结构相适应；二是投资的部门结构是否与社会的中间需求结构相适应；三是投资的部门结构与需求结构是否经常处于动态和相互促进的对应状态。第三，投资的部门结构是否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各种资源。第四，投资的部门结构是否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从区域结构考察，投资结构的优化应当有如下几个标志：第一，应当重视发挥各个区域的绝对优势；第二，应当重视发挥各个区域的相对优势，并应当将这两种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从项目结构的角度考察，投资结构的优化标志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单个项目的规模经

济水平是否达到了要求；二是各种大中小型项目的规模比例是否适当；三是建设项目投产后的分工、协作关系如何。

投资结构优化从何处入手，根本的理论依据和策略是什么？我们分析了目前已经出现的几种基准：筱原基准、赫希曼基准和偏差协调基准。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比较适合我国投资结构优化的基准是相机抉择基准。所谓“相机抉择基准”是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国情的投资结构变化状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调节方法。我们之所以将其作为优化我国投资结构的基准，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基准的确立应当考虑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二是基准的确立应当具有整体性的特征；三是基准的确立应当具有动态性的特征；四是基准的确立应当具有个别性的特征。我们认为，相机抉择基准既兼容了目前业已存在的各种基准的优点，又具有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个性，所以，它应当成为我国优化投资结构的主要基准。

优化投资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庞大的过程，需要人们对其基本目标作出一个轮廓性的界定。我们认为，优化投资结构的目标应当包括直接目标、中间目标和战略目标。1. 直接目标。我国投资结构优化的直接目标是，在 3—5 年期间，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扭曲的主要方面矫正过来：一是解决基础产业滞后的格局；二是解决基础结构滞后的问题；三是遏制低级化的加工业的发展。2. 中间目标。直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要实现投资结构优化的最终目标还需要一个中间的过程即中间目标。中间目标，一是使得基础产业和基础结构达到适度超前的水平；二是为实现投资结构的高度化奠定基础；三是克服投资结构的区域趋同化倾向。3. 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也是最终目标。它应当是一个建立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的、具有良性循环机制的投资结构。

第十章就优化投资结构的条件、障碍和途径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性建议。投资结构的成功转换是实现投资结构从非优化状态向优化状态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我们认为，投资结构优化的条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投资结